

顧頡剛 著

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



顧頡剛著

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瞿 劍

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

顧頡剛 著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127/8 印張·261 千字
1988 年 11 月第 1 版 198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 001—3200 冊
統一書號：11018·1483 定價：4.00 元

ISBN 7-101-00025-8/K·12

前言

一九二九年九月，顧頡剛先生應燕京大學之聘，任國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歷史學系教授，開「中國上古史研究」課。這個課程講了兩個學期，從這年十月講起，到第二年六月講畢。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就是這一時期所編的講稿。這部講義的編寫經過，他在自序中講了的，這裏就不再重複，而僅補充一些他處與講義有關的記載，讓讀者對此書有更多的瞭解。

顧頡剛先生認為先秦至兩漢的古書中所載的古史都是傳說，其中「糅雜了許多非歷史的成分」，但二千多年來却一直公認這些傳說為古代史實。因此他立志要把它一個一個推翻，恢復它的傳說原貌。一九二三年，他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時，就想把傳說中的古史，一部書一部書地弄清楚，他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前記」中說：「我很想做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把傳說中的古史的經歷詳細一說。……但這個题目的範圍太大了，像我這般沒法做專門研究的人，簡直做不成功。因此，我想分了三個題目做去：一是戰國以前的古史觀，二是戰國時的古史觀，三是戰國以後的古史觀。後來又覺得這些题目的範圍也廣，所以想一部書一部書地做去，如詩經中的古史、周書中的古史、論語中的古史。我想若一個月讀一部書，一個月做一篇文章，幾年之後自然也漸漸地做成了。」可見一部書一部書地考辨古史傳說，是他創立「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時就有的想法，但在以後長達六年的時間

裏，這個想法一直沒有能實現。到燕京之後借着講課的機會才把它做出來。因此這部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實際上就是一部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但他並不是只用傳統的考據方法一部書一部書地把其中的古史傳說孤立地考證它產生的時代，而是進一步用歷史進化論的方法探索這些傳說產生的時代背景和承前啓後的演變過程，以證明二千多年來公認的古代史實是由不同歷史時期的古史傳說演變而成的，所以他說：「我編輯這份講義的宗旨，期於一反前人的成法，不說哪一個是，哪一個非，而只就它們的發生時代的先後尋出它們的承前啓後的痕跡來，又就它們的發生時代背景求出它們的異軍突起的原因來。我不想取什麼，丟什麼，我只想看一看這一方面的史說在這二三千年之中曾起過什麼樣的變動。」老子云「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又云「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這便是我使用的方法。我想，待到它們的來源和變動都給我們知道了之後，於是它們在事實上的地位可以一個一個地推翻，而在傳說上的地位可以一個一個地建設了。這是我的研究這學問的大目的，而這編講義乃是個造房屋的草圖。」（自序一）既然這些公認的古史事實都是傳說，就不存在「哪一個是，哪一個非」的問題，也不存在「取什麼，丟什麼」的問題；而只有實事求是地尋出「它們的來源和變動」，而每一個傳說的來源和演變一弄清楚，也就自然地推翻了它的史實假象，而顯露出傳說的真相。因此，這部講義是他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提出之後，「收集本證旁證，一一加以說明」，以堅讀者「諸君之信」的奠基之作。

一九三〇年八月，顧先生在古史辨第二冊自序中說道：「現在我很想在古史辨之外更作兩部書，一

是古史材料集，一是古史考。材料集是把所有的材料搜集來，分類分時編輯，見出各類和各時代中包孕的問題；古史考則提出若干較大的問題，作爲系統的研究。這是足以使得古史的材料及辨論都系統化的；不過這兩部書的完工很不容易，恐怕要遷延到我的垂老之年吧！」在這裏，他說了要作古史考，對若干較大的問題，作系統的研究，而沒有具體說出那些問題，也沒有跟編寫這部講義聯繫起來。但到一九三三年，顧先生在古史辨第四冊序中談到古史考時則具體說了要編寫帝繫、王制、道統、經學四個考的計劃，而這個計劃則是在編寫講義時想出來的。顧先生這部講義，最初擬分作三編：甲編——舊系統的古史，乙編——新舊史料的評論，丙編——新系統的古史。後來看到陸懋德的中國上古史講義，類於他擬編的丙編，於是擬專講舊系統，去掉丙編，以乙編中評論舊史料的話合於甲編，另以三代制度史作爲乙編，分爲二編：甲編——三皇、五帝的來源，簡名爲帝繫考；乙編——三代制度的來源，簡名爲王制考。可是，在編寫這部講義的過程中，他對古史傳說的認識不斷深化，從而對考辨舊系統的古史想法也更爲全面而嚴密，於是又增加了道統、經學兩考，並把這四考合稱爲古史考。他在古史辨第四冊序中說道：「可是不幸得很，編了一年，甲編尚未編完，更說不到乙、丙兩編。所以然者何？只因舊系統方面，我想編四個考：一、辨古代帝王系統及年歷、事蹟，稱之爲帝繫考。二、辨三代的文物制度的由來與其異同，稱之爲王制考。三、辨帝王的心傳及聖賢的學派，稱之爲經學考。這四種，我深信爲舊系統下的僞史的中心，倘能作好，我們所要破壞的僞史已再不能支持其壽命。我很想作成之後合爲古史考，與載零碎文字的古史辨相輔而行。可是一件事情，計劃容易，實做甚難。帝繫、道統兩考比較還簡

單，而王制和經學的內涵則複雜萬狀，非隱居十載簡直無從下手。因此，在燕大所編的上古史講義只成了帝繫考的一部分，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清華學報六卷一期）即是這一部分中的一部分。此後爲了預備作王制考，改開了尚書研究一課，一篇篇地教讀，借它作中心而去吸收別方面的材料。「這個龐大的古史考系列，也就是顧頡剛先生心目中全面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因此這部講義又只成了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他的古史考雖然未能作成，但他提出的帝繫、王制、道統和經學四考，確是抓住了考辨古史傳說的中心，是他深遽、宏偉的構思，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對後人繼起考辨古史傳說有參考意義。他自己也說：「將來這方面的研究是一定有本國的同志起而繼續之的，我很願他參考我的計劃。」

任何重要事物的研究，從開始提出疑問、設想，到最後解決，往往要經過幾代人長期不懈的努力，考辨古史傳說的問題同樣如此。所以顧頡剛先生在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一文中又說：「有人說：『古史辨的時代已過去了！』這句話我也不以爲然。因爲古史辨本不曾獨佔一個時代，以考證方式發現新事實，推倒僞史書，自宋到清不斷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至於沒有考出結果來的，將來還待考，例如「今古史問題」，這一項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又哪裏說得上「過去」。凡是會過去的祇有一時的風氣，……所以即使我動筆不寫了，到安定的社會裏還是會有人繼續寫的，祇有問題到了合乎事實的令人信服的結論，像僞古文尚書一案，才沒有人會浪費精神去寫，這是我敢作預言的。」無論作任何研究，考辨材料的真僞、時代及其性質，總是基礎工作。因此古史傳說的考辨工作如

顧先生所說的還要長期做下去。

此書最後三章，曾在刊物上單獨發表過，第三十二章孔子家語五帝篇，曾以王肅的五帝說及其對於鄭玄的惑生說與六天說的掃除工作的篇名刊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北京大學潛社的史學論叢第二册，加了一個「前記」，並改寫了第一段。第三十三章後期的三統說，曾用三統說的演變的篇名刊於一九三六年三月的浙江省立圖書館的文瀾學報第二卷第一期，後面有童書業的一篇跋，又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中編，第三十四章潛夫論，曾用潛夫論中的五德系統的篇名刊於北平研究院的史學集刊第三期，童書業也加了一篇跋，又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中編。

這部講義，燕京大學曾油印發給聽「中國上古史研究」課的學生，由於印數少，很少流傳。而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幾次大劫難，留存下來的更少。第二學期講義序目油印本未刻印，後來發表在古史辨第五册，這次據以補入，並核對了顧先生的手稿，但爲了便於翻檢，沒有按原來的順序置於第二十六章之前，而是移置於書首，並將「序」和「目」分開，第一學期講義序，改爲「自序一」，第二學期講義序改爲「自序二」，兩個學期講義的目合在一起，接着通排。書中每章原來都僅有數字順序而沒有章名，這次整理時都據目錄增加了章名。

顧先生的這部講義的手稿保存了下來，整理時據手稿改正了油印本刻印的差錯。後來顧先生在油印本上又作了一些增訂，也照着改正。引文的差錯，則核對原書改正。

王煦華一九八八年五月三〇日

自序一

本學期的講義編到這裏，已快放寒假了，只得作一個小結束。趁這個機會，請讓我把編講義時的意見與計畫陳述一下。

中國的古史，爲了糅雜了許多非歷史的成分，弄成了一筆糊塗賬。漢以下的學者從事整理的雖很多，但這些材料太亂了，没法摸出一個頭緒來，不得不各自用了主觀去定取舍，分前後。但這樣地定了，分了，在各個人的本書裏看去似乎已很整齊，很清楚，而在古史的全體中則反而加增了一層混亂，使得於原來的糊塗賬之外更添出一筆新的假報銷來。因爲這個緣故，二千年來談到古史總是沒辦法。倘使我們再用了他們的方法做下去，所得的結果不過在已失敗的古人之後更照樣地失敗一次而已。

只有司馬遷和崔述，他們考信于六藝，凡六藝所沒有的，他們都付之不聞不問。這確是一個簡便的對付方法。但六藝以外的東西並不曾因他們的不聞不問而失其存在，既經有了這些東西，難道研究歷史的人可以閉了眼睛不看嗎？況且就是六藝裏的材料也何嘗都是信史，它哪裏可以做一個審查史料精密的標準呢？所以他們的不信百家之言而信六藝，乃是打破了大範圍的偶像而崇奉小範圍的偶像，打破了小勢力的偶像而崇奉大勢力的偶像，只掙得「以五十步笑百步」的資格罷了。

我們現在受了時勢的誘導，知道我們既可用了考古學的成績作信史的建設，又可用了民俗學的方法

法作神話和傳說的建設，這愈弄愈糊塗的一筆賬，自今伊始，有漸漸整理清楚之望了。但是這件事業太大，牽涉到的問題太多，決不是幾個人在短時間內所可窮其究竟的。

前數年，我曾研究了這方面的幾個問題，又把若干篇討論文字合成一册古史辨。因此，社會上以爲我是專研究古史的，就有幾個學校邀我去任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只有遜謝。這因擔任學校的功課必須具有系統的知識，而我僅作了些零碎的研究；試問圖樣未打，模型未製，如何可以造起渠渠的夏屋來呢！若說不妨遵用從前人的系統，那是違背了我的素志，又是不願意幹的。

民國十六年的秋天，我到廣州中山大學。到的時候已開課了，功課表上已排上我的「中國上古史」了，而且選課的人也選定了。這一急真把我急得非同小可：這事當怎麼辦呢？沒有辦法，只得編講義而專印材料，把許多人的零碎文字鈔點出來，約略組成了一個系統。那時所印的材料分作五種：

甲種——上古史的舊系統，以史記秦以前的本紀、世家爲代表；

乙種——史記本紀、世家所根據的材料及其他真實的古史材料（其實這兩類不應合在一起）；

丙種——虛僞的古史材料，古代的神話傳說與宗教活動的記載；

丁種——古史材料的評論；

戊種——豫備建立上古史新系統的研究文字。

這樣地教了一年，搜集到的材料不能算少，但自問把這些材料系統化的能力還差得遠；而且範圍太大，一個人也不能同時注意到許多方面。所以第二學年開始的時候，就改講了別種功課。

本年到燕京大學來，也同中山大學一樣，「中國上古史研究」的課目早公布了。幸而我有以前一年的豫備，不致像那時般發慌。但前年編的是些零碎材料，沒有貫穿的，又以粵校印刷方便，故可充分點印，現在則不該如此，亦不能如此了。計畫的結果，擬就舊稿改爲較有系統的敘述。後來想，前年分作五種，只以先讀史記致然，現在則分作三編就夠了。這三編是：

甲編——舊系統的古史，

乙編——新舊史料的評論，

丙編——新系統的古史。

因爲有此計畫，故講義的首頁便寫作「甲編」，並擬在甲編中分作夏前和夏後兩部分，故以夏前部分寫作「甲編之上」。那時計算時間，每一編只佔到兩個月多，這「甲編之上」只可講一月餘，所以我竭力地把篇幅節縮，起首數章寫得很簡單。

不久，看見本校陸懋德先生所編的中國上古史講義，他是專從信史一方面講的，類于我擬編的丙編。我想，那很好了，我在新系統的古史方面既無切實的把握，又幸有陸先生在前，我樂得藏拙了。於是擬專講舊系統，去掉丙編，又以乙編中評論舊史料的話合於甲編，另以三代制度史作爲乙編，而爲：

甲編——三皇五帝的來源，簡名爲帝繫考，

乙編——三代制度的來源，簡名爲王制考。

這因舊系統裏，虛僞的史事叢集於帝繫和王制兩類之中；三皇五帝，人和事都不真；三代文物，則人雖

真而事多假。如能把這兩種問題作成較有系統的說明，對於審查舊史料之道亦可謂思過半矣。我於是想把「甲編之下」也攔着了（這方面的偽史不多，和三皇、五帝材料的質量相差太遠，不講也不算缺典）；既無「之下」，自然這「之上」二字就可塗掉了。

可是過了些日子，事實又逼迫我變更計畫了。三皇五帝一問題的講義，開頭固甚簡單，但後來忍不住了，漸漸地放手了；開頭每章只寫幾百字的，到近來每章都成一萬字了。這樣的下去，到這一學年之末不過把甲編講完而已（如緯書、道書、劉歆、王肅、河圖、洛書、皇極經世、外紀、前編、路史、釋史等等都是很大的題目，如不趕緊，恐怕到這一學年之末還講不完呢），哪有餘力再寫乙編。若說節省字數，又覺得這個問題牽涉太多，如不收集本證旁證，一一加以說明，怕要看不明白，即使看得明白也無以能堅諸君之信。而且我們這一課定名爲「研究」，大可借着討論史料的真偽問題使得它研究化，正不必但以灌輸常識了事。所以現在的決定，連這「甲編」兩字也刪去了。

至于原意放在乙編中討論的問題，如分州，封國，建官，制爵，改正朔，易服色，封禪，巡狩，賦稅，喪服……等等，擬於下學期每星期三的一小時裏在黑板上寫些出來。

我編輯這份講義的宗旨，期於一反前人的成法，不說哪一個是，哪一個非，而只就它們的發生時代的先後尋出它們的承前啟後的痕跡來，又就它們的發生時代的背景求出它們的異軍突起的原因來。我不想取什麼，丟什麼，我只想看一看這一方面的史說在這二三千年之中曾起過什麼樣的變動。老子云：「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又云：「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這便是我使

用的方法。我想，待到它們的來源和變動都給我們知道了之後，於是它們在史實上的地位可以一個一個地推翻，而在傳說上的地位可以一個一個地建設了。這是我的研究這門學問的大目的，而這編講義乃是個造房屋的草圖。

七年前，我和劉挾葵、胡蘆人兩位先生討論古史的時候，曾說：

我想把胸中所有的意見詳細寫出，算做答文，與兩位先生討論下列諸項問題：（1）禹是否有天神性？（2）禹與夏有沒有關係？（3）禹的來歷在何處？（4）禹實是什麼時候做的？（5）后稷的實在如何？（6）堯、舜、禹的關係如何？（7）堯典、皋陶謨是什麼時候做的？（8）現在公認的古史系統是如何組織而成的？——以上的題目當在一二月內做畢，登讀書雜誌。（古史辨第一冊九七頁）

不幸這八個題目我只做了（1）、（2）、（3）、（5）、（6）五題，讀書雜誌已停刊了，劉、胡諸先生也不再和我討論了。我自己又因感到這牒下的三題（禹實一題，堯典、皋陶謨一題，古史系統一題）內容太複雜，搜集的材料愈多而不易解決的問題也愈多，不敢輕于下筆。到今六年，永遠是一筆頓在心頭的債。加以衣食所驅，人事所困，數年來得不到一個澄心研慮的環境。每念這三個問題是不是終無作答之望，為之焦躁欲絕。自來本校，在國學研究所中提出「堯典、皋陶謨、禹貢之著作時代」一題，得蒙通過，快慰無量。又在史學系中擔任此課，所編講義即是說明「現在公認的古史系統是如何組織而成的」一個問題。到本學年之末，這個問題當可得到一個粗略的結論了。再過多少時候，尚書中首三篇的著作時代

又可研究出些結果來了。七年前許下的願有了還願的時期，怎不使我距離三百！

這份講義是我親手編的，我當然知道裏邊的種種缺點。現在寫了出來，俾便諸君討論，也使我將來的修改：

其一，是多寡的不均。這便是上面說的，起首數章太簡單了，有許多應收進的材料不曾收進（如講詩經時未把周代金文作比較），有許多應指出的時代背景不曾指出（如孟子稱堯、舜為帝，這帝字和戰國時勢的關係怎樣，文中未講），有許多應作說明的不曾說明（如堯典中的義和四宅，巡守四岳，九官出身等等）。

其二，是先後次序的不合。天問一篇應移前，呂氏春秋十二紀中的五帝應移後，已在講義中提及了。但尚有未提及的，如堯典，其中言定時成歲，言封禪巡守，皆是秦、漢間的大問題，又以「羣牧」與「羣后」連言，使郡縣制和封建制同時存在，也是很顯明的漢代事實。這篇書實應移後，與五帝德等駢肩纔對。

其三，是漏舉了許多書籍。尚書中除了首數篇外固然講到夏前歷史的很少，但呂刑中說着「三后」（禹、稷、伯夷），作者的古史觀念還與詩經相似，應當列於詩經之次。又如墨子，它裏面說的古史雖沒有新奇之說，但它喜講堯、舜、禹、湯，與儒家的古史觀念很相像，亦應列於論語、孟子之間。墨家的學說固在孟子之前，但墨子這部書結構整齊，立了題目發揮，似出于孟子以後。又如講騶衍的「大九州」學說以前，應將禹大九州的基礎的「禹之九州」先說一下，故禹貢亦應列入，講騶衍的五行學說以前（或以

後），應將爲五行說宗主的洪範說明一下，故洪範亦應列入。又如講莊子的「快樂在古代」的學說時，老子一書也該列入，以其中把「善爲道者」屬於「古之聖人」，又言「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它的古史觀念與莊子相一致也。

其四，是分別部類的有疑問。此編以儒家爲中心，故分爲「儒家以前，戰國的儒家，戰國、秦、漢間的非儒家，西漢的儒家」四部。這是因爲漢以後的古史爲儒家所統一，遂以儒家爲主而對於漢以前的紛紛之說作如此的分畫。但這個界限並不嚴密。例如騶衍這人，以前是無疑地放在陰陽家裏的，董仲舒這人，以前是無疑地放在儒家裏的，但我們既已懂得了他們的學說「辯若畫一」之後，我們還能支配他們一列於儒家，一列於非儒家嗎？如果把騶衍改列儒家，則承襲他的學說而又態度不明的呂氏春秋應入何家，便成一個疑問。又如世本，它自己本沒有說是哪一家，我因它爲史記所採用，就放在儒家裏，也覺得不安。我很想不分家派，一律以時間先後定次第，但如果這樣，在思想的系統上又不分明了，而且能把著作時代考得確定的有幾部書呢。所以將來修改時究應如何排列，尚須費去一番斟酌的工夫。

以上四項是我自己指得出來的缺點。還有自己指不出來的缺點，如論斷或落於主觀，以致有武斷及深文周納之處，又如引用材料或有錯誤，以致所作的記載有不合事實之處，這都待諸君的嚴正的批評了！

顧頡剛十九，一，三。

自序二

這一學期所講的，是我們的古史中的一個最大的癥結。這個癥結自從發生以來，大家莫名其妙地在信奉，就是對它懷疑的人想要攻擊它，也因各方面的材料都給弄亂了，尋不到一個頭緒，無法下手。攻擊既不可能，於是編起古史來，雖明知它是荒謬，也不得不依聲學舌，照鈔一遍。

一方面，又因帝統卽是道統，而道統是國性國本之所繫，所以這一個系統就成了國家的功令，倫理的中心，有不信的就是離經畔道，該在誅滅之列。因此，即使有人能想出方法去解開這個癥結，但在專制時代也是不敢做的。

因爲有這兩個原因，所以從王莽時代直到清代，這一千八百年之中，這個破綻甚多的系統卻能安穩地維持下去，統一所有的歷史書。

不幸清代是一個整理古文籍的時代，什麼古書都要研究，把它們的本子問題弄得一天比一天清楚。這樣一幹，許多僞書及真書中竄僞的部分就露出馬脚來了。書籍的著作時代既成了學術界中的重大問題，則書籍裏邊記載的古代史事自然聯帶發生了問題。到了十八世紀之末，崔東壁先生（述）便把戰國以上的書和戰國以下的書分成兩組，作比較的研究。結果，他指出戰國以下的書裏所述的古代史事的無數誤謬，說明它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造僞的方式。他做了一部考信錄，對於古史作徹底的考

究，去其妄而存其真。他的考信的工具是孔子的經，因為這些書出得早，保存的原來樣子多。凡不合于經的，即爲百家雜說，不該信它。但是經中所記的古史本不很多，如何能把百家雜說一一量度了呢？所以他又收取了次一等的材料進去，即是解釋經書的傳記和羽翼經書的諸子。他這個工作做了四十年，把東周以上的歷史完全審查過了。這是一次大清理，自從有了這個癥結之後所不曾有過的清理。

可是，我們在這半年中所講的癥結，是經學極昌盛的時代所發生的，故這些病菌蔓延在百家雜說裏的遠不及其蔓延在經和傳記裏的多。崔先生是信經的，經以外是信傳記的，所以這個系統雖被他打了幾拳，但沒有中着要害，仍無礙其生存。

又過了一百年，到十九世紀之末，康長素先生（有爲）起來，大膽作新學僞經考，把經傳中的一部分也排除出去，這纔鞭辟入裏，打碎了這個系統。這固然是他的成功，但若沒有他以前的一班漢學家和今文學家專力把漢代經學的派別一一理清，把久已忘記了的今古文問題重新提起，則他也不能獲得這個大發見。原來漢代的經學因發生時代的先後，及其發生時代的社會需要，分爲今文和古文兩大宗。今文方面，本來沒有統一過。古文一派，則在劉歆的學術和王莽的政治的指導之下，自成爲一個系統，與原有的經學爲敵，這原有的經學就被名爲今文。古文一派爲適應時勢的需要及攻擊今文家起見，不但自有其經說，亦且自有其經書，這些經書比了今文家的，除了文字異同之外，又往往有所增益，這就是他們的僞作品。康先生既特爲一書，闡明此義，於是往常看一切經傳同在孔子的意旨下的，到這